PEST整合分析模型在教育政策反思性研究中的应用——基于教育博士生政策研究能力提升的思考

裴李伟[1] 付健[2]（通讯作者）

1.云南工商学院，中国·云南 昆明 650000

2.昆明文理学院，中国·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教育政策研究的基础方法是政策文本分析法，教育专业博士生在面对纷繁复杂、纵向跨度长、横向跨度大的教育政策研究时，大多无法自如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法，走进政策文本如同身处“迷宫”，往往只能停留在文本梳理和比较层面，无法深入教育政策的反思性研究。通过教育博士生教育政策研究案例分析，发现深入教育政策反思性研究需改变单一的政策文本分析法，转向以 PEST 整合分析模型，产生俯瞰效应，解决教育专业博士生无法抽离微观视角开展反思性研究这一难题，继而提升博士生的教育政策洞察力和科研反思力。

关键词：教育政策；文本分析；PEST；反思性研究

Application of the PEST Integrated Analysis Model in Reflective Research on Education Policy — Thoughts on Enhancing Policy Research Skills of Doctoral Students in Education

Pei Liwei[1], Fu Jian[2](Corresponding author)

1. Yunnan University of Business, China Yunnan Kunming 650000

2. Kunm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China Yunnan Kunming 650000

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method of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is policy text analysis. When doctoral students in education face complex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with long vertical spans and broad horizontal coverage, most struggle to effectively apply policy text analysis. Engaging with policy texts often feels like being in a "maze," usually limiting them to just organizing and comparing texts without delving into reflective research on education polic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cases by doctoral students, it was found that in-depth reflective research requires shifting from a single policy text analysis approach to the PEST integrated analysis model, which provides a bird's-eye view. This addresses the difficulty education doctoral students face in stepping back from micro perspectives for reflective research, thereby enhancing their policy insight and research reflection skills.

Keywords: Education policy; Text analysis; PEST; Reflective research

1 问题提出

教育专业博士生在研究教育问题时，难以回避教育政策。教育专业博士生对教育政策的认知深度，直接影响其研究的问题是否为“真问题”，是否具有研究价值，是否对当代中国教育发展具有推动意义。

政策文本分析是教育政策研究最基础、最常用的方法。国外政策研究中，Ball（1993）指出，政策不能简单等同于单一文本，而应被理解为文本、话语与实践相互交织的过程；Taylor（1997）倡导批判政策分析，强调不仅要分析政策文本本身，还要关注政策产生的语境及其后果[1-2]。国内教育政策研究者袁振国（2000）、刘复兴（2003）、褚宏启（2011）等学者从教育政策价值分析、教育政策学等角度，系统讨论了教育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价问题[3-5]。近年来，教育政策文本分析逐渐形成内容分析、话语分析、框架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文本挖掘等多种路径，广泛用于分析课程改革、教师政策、德育政策、高等教育政策等领域。总体来看，政策文本分析有助于把握政策内容、政策工具和价值取向，但现实研究者容易将视野局限于政策文本的横向比较和纵向梳理，将政策视为静态文本，忽视政策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环境，难以解释政策生成与演变的宏观机制，不利教育政策反思性研究往高阶深层发展。因此，仅靠文本分析法，



图 2-1 教育政策反思性研究 PEST 整合分析模型图

研究者容易陷入“迷宫”，难以形成对教育政策的整体性理解。

PEST 分析模型源于战略管理中的宏观环境分析。PEST 分析的优势在于提供一个“俯瞰视角”，帮助研究者跳出具体文本和局部细节，从更广阔的背景中理解政策的生成与演变。政治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政治制度、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经济环境因素包括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经济的发展水平等；社会环境因素包括社会结构、道德风尚、文化传统、教育和价值观念等；技术环境因素包括社会技术水平、技术突破方向等。作为我国学者运用较为普遍的一种社会环境研究方法，PEST 分析应用较为广泛，是调查分析相关行业所处社会环境的有效手段。已有分析研究虽能提供宏观视角，但常与具体政策文本脱节，缺少面向教育专业博士生的可操作研究框架。

本研究以《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博士论文为案例文本，尝试将 PEST 分析框架与政策文本分析结合起来，以期为教育专业博士生走出教育政策研究“迷宫”提供一种“俯瞰视角”与“显微视角”相结合的方法参考，从而提升教育博士生的政策研究能力。

2 核心概念及分析模型

（1）PEST。PEST 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的英文字母缩写。代表政治（Political）、经济（Economic）、社会（Social）和技术（Technological）四个维度。政治维度涉及政府、法律、政策、权力结构等；经济维度涉及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投入、市场机制等；社会维度涉及人口、文化、价值观、社会需求等；技术维度涉及技术发展、媒介变革、教育技术等。

（2）PEST 整合分析模型。本研究中的 PEST 整合分析模型，以“PEST+ 文本”整合呈现，是指以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四个维度为分析要素，对教育政策制定与演变所处的宏观环境进行系统扫描，按照“描述文本 – 理念 – 系统解释 – 批判反思 = 实践进路”五步分析框架，形成“俯瞰视角”的分析工具。它不替代文本分析，而是与文本分析结合，帮助研究者解释政策理念为何生成、如何变迁、怎样受宏观因素影响。文本分析是基础，提供微观视角；系统分析是拓展，借助 PEST 框架形成宏观视角。具体而言，第一次跃升靠文本分析，从表面文本到深度理念；第二次跃升靠 PEST 系统分析，从文本分析到系统分析；第三次螺旋上升靠“PEST+ 文本”交替运用，确保研究价值并进入反思性研究。如图 2-1 所示。

3 案例的选取

针对教育专业博士政策研究的实际困境，笔者选取一篇博士论文《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作为单案例研究对象，通过对该案例的解构，探析论文作者对日本中小学道道德教育展开教育政策研究的方法论价值。选取《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作为案例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1）案例契合研究对象筛选标准。本研究筛选教育政策文本纵向跨度长、横向维度多的样本。该案例中的日本道德教育政策时间跨度近三十年，涉及日本学习指导要领、道德教育推进政策、相关法律法规和官方报告等多类政策文本。纵向跨度长，意味着可以观察政策理念的阶段性变迁；横向维度多，意味着可以分析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多重因素。这种文本结构，正是教育专业博士生政策研究中容易陷入困境的典型场景，适合用来验证分析 PEST 整合分析模型能否帮助研究者走出困境。

（2）案例典型。相关政策随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技术变迁明显。单案例研究中，案例的“典型性”比“代表性”更重要。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政策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经历了从战后民主道德教育到传统文化道德，从大众道德到职业道德，其政策历经了三次以上调整。

（3）案例可迁移。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政策研究涉及政策理念如何变迁、宏观环境如何影响政策、政策落地形态等。中国教育专业博士生在研究本国教育政策时，面临相似性问题，该案例对教育专业博士生开展教育政策研究具有参考意义。

4 教育政策反思性研究的演化进路

佐藤学将教育研究分为三类研究视角："飞鸟之眼""蜻蜓之眼"与"蚂蚁之眼"。[6] 在教育政策研究范畴中，PEST 分析对应"飞鸟之眼"的研究视角，具备宏观审视优势，但易停留于表层认知；文本分析对应"蚂蚁之眼"的研究视角，具备微观精准特征，但研究视野存在局限。然而，教育政策研究也并不追求"蜻蜓之眼"式的浅尝辄止，而是追求多研究视角的对话融合，唯有如此才能整合不同视角的优势，形成洞察力更强的研究进路。

教育政策研究需经历两重思维跃迁：第一重是从表层文本分析到深度文本分析，第二重是从文本分析到系统分析。两次思维跃迁本身就是多视角对话的过程，具体体现为以 PEST 分析框架为核心的宏观"俯瞰视角"与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微观"显微视角"相结合的 PEST 整合分析式教育政策研究范式。

4.1 研究的第一次跃升：挖掘"理念"——从表层文本分析到深度文本解读

第一次跃升主要解决教育研究者"进入研究场域—明晰研究对象"的核心问题。推动政策研究深化的核心路径之一，是对政策制定理念开展系统性剖析。政策研究实现深度跃升的核心前提是提炼政策制定的核心理念：若仅针对政策文本的表层文字开展分析，未引入抽象概括的逻辑思维环节，研究仅能停留在浮光掠影的感性认知层面，无法开展严谨的理性批判，此类研究不符合学术规范的基本要求。对《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的研究》，无法脱离对相关政策文本的系统梳理。该论文对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政策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剖析，并未止步于对政策文本的简单梳理与比较，而是进一步回溯政策制定初期与中期的原始文本，提炼核心概念，开展共性归纳与聚类分析，并结合明治维新政治改革的历史背景，充分挖掘政策制定背后的核心理念。

从不同学科视角来看，政策制定的"理念"在政治学语境中对应党派政治主张，在社会学语境中对应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在政策研究语境中则直接定义为政策制定理念。教育研究者唯有准确提炼政策制定的核心理念，才具备从整体层面把握研究问题的基础。

由此可见，从表层文本分析到深度文本分析的转换，是教育政策研究的第一次跃升，该阶段核心解决研究者"进入研究场域—明晰研究对象"的问题。但第一次跃升并未将研究推进至反思性研究层面，其原因在于仅提炼政策制定理念仅需分析与概括两类逻辑思维的参与，此类研究无法被界定为严格意义上的反思性研究。真正的反思性研究以批判性思维为核心，也可称之为创新性思维，其核心价值体现为对现实问题的能动性回应与解决。也就是说，准确提炼政策制定理念并不等同于完成批判性研究，政策研究仍需推进至第二次跃升。

4.2 研究的第二次跃升，观照"现实"：从文本分析到系统分析

前文指出，在教育政策研究的第一次跃升过程中，政策文本分析法发挥了核心作用，教育专业博士生借助分析与概括的逻辑思维能力，基本可完成第一次跃升，提炼出政策制定的核心理念。但既有研究仍未回应以下问题：如何把握政策理念的变迁轨迹？政策理念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何种影响？政策理念又如何逐步形塑教育实践样态？推进研究至此阶段，要求研究者跳出单一文本局限，以宏观俯瞰视角把握微观研究问题，实现从文本分析到系统分析的研究范式转换。而研究视角的转换通常需要研究方法的更新作为支撑，依托传统文本分析方法难以进一步推进研究、回应上述核心问题，PEST 分析框架则为该类问题的解答提供了有效工具。PEST 分析框架是指从政治（Political）、经济（Economic）、社会（Social）和技术（Technological）四个维度对政策所处宏观环境开展系统性分析的研究工具[7]，该框架可为研究者提供宏观"俯瞰视角"，帮助研究者跳出政策文本的研究局限，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理解政策的制定逻辑与演变轨迹。PEST 分析的核心指向是厘清社会背景、经济因素与技术发展对教育政策的多重影响。该论文针对日本道德教育研究体现了三大研究主体——政策制定者、学术界、中小学实践者，正是 PEST 分析模型应用于教育政策研究的典型实践。[8] 同时，依托 PEST 分析，研究深入剖析了政策制定者所处政治环境对教育政策方向的形塑作用，梳理了日本社会文化变迁对道德教育内容与实践方式的推动机制，最终完成对日本中小学道德危机根源的剖析。该分析不仅清晰揭示了教育政策背后的多维度驱动因素，更系统呈现了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其如何共同形塑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的发展现状与演进趋势。

依托 PEST 分析，教育专业博士生可突破单一政策文本的研究局限，在更广阔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技术背景中理解教育政策的生成逻辑与演变路径，实现从文本分析到系统分析的研究跨越。这一转变，既拓展了教育政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为教育专业博士生跳出文本研究局限、开展反思性研究提供了可行路径。

4.3 研究的第三次螺旋上升，锚定“价值”：PEST 整合分析

在教育政策研究领域，单一依托文本分析法易导致研究者陷入研究细节，难以从整体层面把握政策全貌与深层意涵。文本分析聚焦于政策文本内部的语词表达、概念界定与逻辑结构，研究者若长期局限于这一微观视角，往往只能捕捉政策表层的话语呈现，难以察觉政策生成所处的复杂背景与制约条件。PEST 整合分析模型的引入，可帮助研究者依托更高研究站位，审视政策制定所处的宏观环境，厘清政策背后的深层动因。研究者得以从政治、经济、社会与技术等多重维度出发，对政策形成的外部条件进行系统考察，从而突破文本本身的封闭性，获得更为完整的认知图景。

教育政策研究中，第一次跃升依托文本分析法，第二次跃升依托“PEST+ 文本”整合分析模型，完成两次跃升即进入反思性研究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已具备足够的实践价值。从教育专业博士生的研究视角来看，所有研究的价值最终都指向实践指导，而实践指导需要明确的对策、建议与研究进路，第二次跃升的研究成果仍未完成面向实践指导的落地。反思性研究固然实现了研究视角的扩展与研究层次的提升，但若止步于对政策现象的系统描述与深层解释，研究成果便仍停留在认知层面，尚未转化为可操作、可检验的实践方案。第一、第二次研究仅依托单一研究方法，实现的是线性研究跃升，而具备更高实践价值的研究，其演进过程更符合“双螺旋式”的逻辑进路，可将其界定为第三次“螺旋式上升”研究。

为何唯有进入第三次螺旋式上升研究才能锚定研究价值？究其原因，教育政策研究并非遵循单向线性的时间演进逻辑，而是需要研究者不断在“表层—里层”“文本—系统”之间切换研究视角，人类思维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跃迁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持续修正、不断丰富的过程中实现螺旋式上升；就教育政策研究的本质而言，其根本属性就是研究者自身认知从感性上升至理性的发展过程。由此要求研究者交替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认知规律来看，感性认识往往停留于对政策现象的表层感知与局部把握，唯有通过反复的视角切换与方法交替，研究者才能逐步剥离表象、逼近本质，完成对政策深层结构与运行机理的理性把握。因此，教育政策研究唯有推进至第三次螺旋上升阶段，才能在双螺旋结构中持续生成契合“客观真实”的研究进路，进而拓展教育政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提升研究成果的现实意义与实践指导价值。

由此观之，《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已完成日本近 30 年的道德教育政策系统研究，作者基于 PEST 整合分析模型完成了反思性研究，但最终并未明确提出本土化研究的实践进路、优化策略与改进对策，未对研究价值进行显性锚定，而是期望政策制定者、中小学实践者与学术界研究者主动揣摩论文观点、践行研究结论。这一研究取向契合纯理论研究者的学术逻辑，同时也折射出长期以来构建专业型区别于学术型博士培养评价体系的难处。

5 结语

于教育专业博士生而言，《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日本中小学道德教育》对改善现实观照不足，第三次研究的螺旋式上升演进存在一定缺憾。通过对该博士论文的方法论分析，可获得如下启示：深度开展文本分析、提炼政策制定的核心理念，是推进教育政策研究走深走实的有效路径；将 PEST 整合分析模型引入教育政策研究，既是研究方法的创新，也是研究思维的转型，该分析模型能够切实帮助研究者突破教育政策研究的文本局限，依托宏观视角完成对政策的解读与分析。上述研究路径的进阶，对提升教育专业博士生的政策洞察力与科研反思能力，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Ball J S.WHAT IS POLICY? TEXTS, TRAJECTORIES AND TOOLBOXES [J].Discourse: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1993,13(2):10-17.

[2] Taylor S.Critical Policy Analysis:exploring contexts, texts and consequences[J].Discourse: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1997,18(1):23-35.

[3] 刘复兴. 教育政策的价值分析[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56-57.

[4] 袁振国. 教育政策学[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16-20.

[5] 褚宏启. 教育政策学[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6-41.

[6]〔日〕佐藤学著，钟启泉、陈静静译. 教师的挑战——宁静的课堂革命[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95-113.

[7] 卫晓毅，向小薇，周建中. 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科研人员参与科学教育的影响因素研究[J]. 中小学科学教育，2026,3(1):17-27+95.

[8] 夏运平，范运祥，刘波.“三区联动”构建大学教

育趣缘文化体系的 PEST 分析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23, 15(2):83-86.

基金项目：2025 年云南省教育厅研究博士专项（编号：2025Y0333）“研学活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云南实践研究”、2026 年云南省教育厅项目（编号：2026J1334）“数智赋能云南民办高校小学卓越教师职前培养的项目化研究”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裴李伟（1999.07-），男，汉族，云南西双版纳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公共管理、项目管理。

通讯作者：付健（1989.07-），男，湖北荆州人，教育博士，昆明文理学院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主要从事教师教育、教育管理研究。